

中国当代红色交响音乐研究——以《红旗颂》为例

张一霖, 郑轶超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 《红旗颂》是作曲家吕其明于1965年创作的交响曲, 本文通过主题发展, 曲式结构、配器手法进行分析, 揭示出作品的民族特色, 展现出红色音乐的精神风貌。

吕其明, 男, 汉族, 1930年5月生, 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安徽无为人。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 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焦裕禄》《雷雨》等200多部(集)影视剧作曲, 创作《红旗颂》《使命》等10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 300多首歌曲,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歌曲广为传唱。

关键词 : 红旗颂; “红色交响”; 吕其明; 传承与发展

Study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Red Symphony Music —Take "Ode to the Red Flag" as an example

Zhang Yilin, Zheng Yichao

Conservatory of Music,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Abstract : "Ode to the Red Flag" is a symphony composed by composer Lv Qiming in 1965.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me development, form structure and orchestration techniques to reveal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 and show the spirit of red music.

Lu Qiming, male, Han nationality, born in May 1930,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September 1945, a native of Wuwei, Anhui Province. He used to b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rt Committee of Shanghai Film Studio.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symphonic composers train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 famous composer of film music. He has composed music for more than 200 films and TV dramas such as Railway Guerrillas, Jiao Yulu, Thunderstorm, etc. He has composed more than 10 large and medium-sized symphonic works such as Ode to the Red Flag, Mission, and more than 300 songs. Songs such as Playing My beloved Local Pipa are widely sung.

Keywords : "Ode to the Red Flag"; "red symphony"; Lv Qiming;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一、创作背景

《红旗颂》创作完成于1965年, 较之于新中国成立到1958年期间, 音乐创作在题材内容、旋律风格、技术选择等方面, 因文艺政策的调整等原因而受到更多的限制^[1]。这首作品生动地描述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 天安门广场里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展示解放以后中国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胜利的庆祝是极其兴奋, 高兴和骄傲的心情。乐曲创作于1965年春季, 以恢弘的气势体现出新中国昂首阔步、奋勇向前的气概, 并表达了热烈、激昂、欢呼雀跃的情感情绪^[2]。1965年5月, 在第六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开幕式上, 著名指挥家陈传熙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 《红旗颂》初试啼声, 反响热烈。随后, 吕其明又根据前辈们的建议进行删减, 让整部作品更加凝练精湛^[3]。

自创作之初, 该作品就与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在1960至1965年期间, 面对1959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纠正和调整措施, 成功地纠正了全国各领域的“左”倾错误, 从而使各种严重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由于毛泽东同志及时采取正确政策, 很快实现了经济恢复并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然而, 在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 党在其指导思想中的“左”倾错误得到了进一步的纠正, 阶级斗争的理念也开始逐步完善; 毛泽东同志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对人民进行阶级分析方法被重新运用到政治斗争领域之中。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教育”与“五反”行动, 进一步推动了党内“左”倾错误观念的深化, 从而使得阶级斗争的放大理论更为明确。中国人民的情感表达是热烈而含蓄的, 这二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直接影响了作曲家的创作技术与观念^[4]。在国家经济面临巨大挑战的时期, 众多的音乐创作者凭借他们坚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2024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项目名称: 《中国当代红色交响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项目编号: SD2024017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 张一霖 (2004.11-), 男, 汉族,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本科三年级, 研究方向: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通讯作者: 郑轶超 (1987.06-), 女,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定的政治立场和卓越的艺术能力，在非常严格的外部环境中，依然为音乐行业带来了持续的繁荣。大量的高质量群众歌曲不断涌现，大型声乐和民族乐队的作品数量也相当可观，而管弦乐的创作也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苏联在音乐领域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在中国的表演，为中国音乐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推动了中国革命历史主题交响乐的发展，吕其明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是那个时代交响乐的经典之作，它采纳了西方的作曲方法，融合了中西文化元素，并在吸纳民族民歌的基础上进行了创作。

二、作品分析

作品《红旗颂》的曲式结构为复三部曲式，引子部分所引用的素材，灵感源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5]。这个素材成为了现代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作品曲式结构为复三部曲式，全曲主题旋律为：。作曲家在节奏部分巧妙地运用了附点音符与十六分之三连音，营造出独特的韵律感；同时，在音调选择大调，赋予作品明快、昂扬的情感色彩。动机在从原调上呈示完毕后，转至上方大二度的C大调。引子部分通过铜管乐器的演绎，以富有感染力的主题音符连续三次激昂呈现，随后，乐曲巧妙地过渡进入了一段充满张力的呈示部。A段音乐结构为单一的二部曲式。乐曲的呈示部分结构为两个乐段，其中A1展现了A主题在D大调下的完整呈现。

A部分由五个乐句组成，展现出非方整型乐段的结构特征。乐段主题a、b、c三个乐句之间，运用了巧妙的过渡旋律进行了连接。在作曲技法上，采用了以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为基础的节奏模式，并巧妙地融入了四分音符，以此构建了丰富多样的音乐节奏结构。

乐谱中采用了音符与全音符的结合。旋律以级进和小跳为主导，但在特定四处运用了显著的大跳手法。使乐曲兼具抒情与大气。B部分是一个由五个乐句组成的非方整性乐段，各乐句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其中，第一乐句f的构成材料源自A乐段的乐句d、e，体现了一种对乐句d、e的变体处理与进一步发展。B乐段在D大调中完成陈述，其终止于D大调的六级和弦，由此引发了调性的不稳定感。在和声上运用阻碍进行的手法引出共计10节连接部，最后以属和弦收尾，展开部中的乐段C是一个由40个小节构成的乐段。主要由三连音构成，旋律以级进为主，穿插小跳和大跳等不同音型的组合，形成一种持续重复的音乐结构，从而创造出一种调性上的动态变化感。乐段C有持续的不稳定性。乐段D的材料源自于乐段A，主要通过调整节奏与速度实现了创新。D1不仅完全复制了D的结构，而且在与D相连的16小节中，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过渡部分。因此，展开部不仅包含了新的材料，还深化并扩展了呈示部中A部分的原始材料，这种结构设计使得它成为一种典型的综合型中段，既体现了创新性，又保持了与前段的紧密联系。乐段最后以^bB大调的属和弦终止，并延伸至16小节的过渡段，随后引入再现部。

再现部选取了呈示部的A段与B段中的特定乐句f进再现，尾声部分持续20小节，经历了三次调性转换，最终结束在C大调的主和弦上收尾，符合奏鸣曲的曲式结构特点^[6]。最后进入尾声，尾声阶段的曲式结构主要呼应引子部分，其通过对引子部分的变化展现实现前后呼应^[7]。

三、配器法分析

全曲采用双管编制的管弦乐团演奏，并于再现部分融入了混声四部合唱，其配器设计清晰且易于理解。引子部分分别由小号、圆号演奏了具有号召力的主题旋律，而木管乐器部分则伴随以悠长时值的震音。弦乐组中：“一提、二提”在演奏中连续运用的六连音技巧与震音技巧。使音乐听起来更加生动和有活力。而大管、长号、大号、大提琴则构成了强化的属七和弦进行。引子部分在倒数第一小节，通过大管、长号、大号、中提琴、大提琴以及低音提琴的合奏出的“**05 | 1 · 11 1 1 5 6 7 |**”，巧妙地将乐曲带入了呈示部阶段。呈示部起始阶段，弦乐部分（包括一提、二提、中提与大提琴）协同演绎主旋律；同时，低音乐器如大管、长号Ⅲ、大号及低音提琴则负责铺垫基础的低音线条。木管组则以持续的五连音模式进行同音重复演奏，此手法在音乐结构中循环往复，为整个乐曲构建了稳固的和声基础。竖琴演奏快速琶音，铜管组在弦乐持续音或换气间隙进行相应补充与呼应。在第二乐段中，abde四个部分采用了木管乐器与弦乐的融合音色进行合奏。大管重奏低音提琴声部，C段落因情感转向由弦乐接替主旋律演绎；而木管部分则以五连音进行同音反复，通过包裹技法在编配手法上予以呈现。铜管乐器的配置手法与第一乐段保持一致。在呈示部的B段中，第一乐句的旋律由双簧管呈现，同时，弦乐组与圆号以简洁的和声角色提供背景式的伴奏。f1乐句融合了多种音色，具体由圆号、中提琴及大提琴协同演奏呈现。F调的第二段仅有两小节，采用长笛与单簧管合奏呈现。紧接着，小号部分演奏了连接段落，随后弦乐组共同演绎了f3这一乐句。在f3的乐句里，长笛与单簧管巧妙地展开了一个基础的模仿复调，共同编织出一段旋律，并对其进行富有创意的装饰与变奏。f4由单簧管、长笛、双簧管与圆号依次演奏，同时，弦乐器提供震音式的背景伴奏。乐章在D大调的六级和弦上终止。接下来是十小节的连接段，其力度从微弱逐渐增强，而使用的乐器种类则从稀少过渡至丰富多样。初始阶段由弦乐器演奏，随后依次融入木管、铜管乐器及打击乐元素。进入展开部后，乐曲特征显著变化：弦乐器协同演奏，形成密集且持续的动态过程，这一段落延展至四十小节，其中三连音的组合呈现出显著的波澜与起伏。在情绪激昂的时刻，铜管乐器与打击乐的突兀加入，营造出一种紧绷的氛围。而由圆号、管乐器与小号合奏出的主题，在这连续三音的序列中交替出现，时而清晰，时而隐匿。

在展开部中g、h、i这三个乐句由木管乐器协同演奏主旋律，其音符流畅而和谐。弦乐器主要承担的是以音型形式作为背景的伴奏，创造出丰富而细腻的声音织体。而铜管乐器则在每个乐句的关键长音部分进行呼应与补充，作品情感也得到进一步升华，达到了

对革命精神纵情高歌的境界^[8]，为整体音乐增添深度与力量感。”在弦乐部分，特别是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负责演绎核心旋律，以弦乐组来演奏“红旗主题”是非常合适的，有利于演绎主题的抒情性及幅度较大的舒展性^[9]。与此同时，木管乐器组则通过演奏连续六个音符的组合，为整个曲调增添层次感与丰富性。乐章于弦乐组齐奏的过渡段后转向D2部分。进入D2部分，木管乐器与弦乐合奏，铜管部与竖琴进行变奏式的旋律演绎。在进入J、K部分时，配器技巧延续了上一乐段的特点，并特别融入了打击乐元素，旨在提升整体的音乐情绪，使其更加激昂。接着，音乐作品中包含一个由16个小节组成的连接部分，其中，弦乐器与铜管乐器以呼应的方式演奏出特定的音型节奏：X·X|X—|X—而木管乐器则在持续音的基础上，采用十六分音符进行连续奏鸣。乐曲过渡至再现部，此段落特征为丰富多元的音色融合大齐奏，同时巧妙融入了混声合唱的元素，以增强情感层次。铜管乐器在此部分适时地进行补充与回应，营造出深邃而富有张力的音乐氛围。大管、大号与低音提琴协同演奏低沉而有力的旋律线条，赋予整体音乐以厚重感。竖琴则以其特有的琶音技巧，为乐曲增添一抹细腻的光泽，使得整个再现部既保持了原有的韵味，又在细节上展现出新的风貌。再现部初始阶段，通过运用最强的力度与最多的乐器数量，构建了乐曲的巅峰高潮。当乐曲过渡至B1段落时，情感经历了一次显著的转变。在这一部分，长笛、单簧管、双簧管、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与圆号、中提琴、大提琴协同演奏，以问答式的旋律交织，营造出既深邃又富有层次感的音乐对话。大管、长号III、大号、低音提琴演奏低音段落。乐曲的终章，小号与圆号担纲主导旋律，木管与弦乐则以六连音的节奏为其伴奏，大管、长号、大号、大提琴及低音提琴则负责演奏低沉的和声，运用C大调T和弦结束。

四、当代红色音乐传承文化

文艺事业在党和人民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艺战线在党和人民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红色音乐承载着红色文化的灵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红色音乐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如何充分激发红色音乐活力，创新红色音乐传播方式，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已成为新时代红色音乐发展的重要命题。遵循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红色音乐发展焕发生机的核心要义。文艺应该爱民如子，红色音乐在新时期的发展不能脱离“人民性”实践而存在。以“人民性”为主要坐标来进行红色音乐的创作与评论，是对红色音乐价值进行考察与判断的一个重要尺度。可以说，那些被历史潮流传唱到今天的红色音乐，无一不彰显着“人民性”文艺思想。比如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文艺工作者在充分汲取历史与现实生活文艺素材的基础上，创造了大量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文艺精品。诞生于这一时期的红色电影音乐，跨越时代成为永恒的经典。如《我的祖国》《英雄赞歌》《延安颂》和《歌唱祖国》这些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不仅源自人民，也致力于服务人民，它们都是通过与人民审美习惯紧密相连的音乐形式来表达的，它抒

发了人民当家作主以后国家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和高昂的民族自豪感，在复兴民族精神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以人为本的时代话语蕴含着“人民性”文艺思想美学特质。

红色音乐所承载的壮阔历史和澎湃的中华儿女对于美好祖国的赤诚情怀，构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的情感寄托和共同回忆。但值得关注的是在改革开放与音乐市场化不断变化的今天，流行音乐快速发展逐步挤压着红色音乐的成长。因受不同文化熏陶的不同年龄阶段人群对于红色音乐的认知与理解存在差异。一些调查显示，一些观众尤其是青年对红色音乐和红色文化内涵的理解不足。为此，我们站在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征程上，认识并把握红色音乐与其“人民性”之间的联系，沿用并贯彻基于“人民性”思想开展音乐创作，这对了解并解决目前红色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文艺为民服务、讴歌时代是新中国艺术界的不懈追求，传承与弘扬蕴涵“人民性”特征的红色音乐是共同任务，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10]。

五、结语

上文中对《红旗颂》的音乐构成进行了精炼的解析：其和声结构与调性布局相对简洁，避免了复杂且激烈的和声冲突，曲式的界限较为模糊。在配器方面，作品大量采用齐奏技术，旨在强化旋律的表现力。铜管部分运用了双音、三音以及五度叠置的手法，而木管组则以三度叠置为主，这些技巧在辅助旋律发展的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衬托作用。此外，音乐作品中穿插了一些外音，丰富了音乐层次。从发展手法来看，《红旗颂》主要遵循主调音乐的原则，较少融入复调元素，即便有局部的复调成分出现，也只是作为辅助性的呼应。整体而言，这首作品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格，这种特质与中国人普遍的审美偏好相契合，成功地展现了民族音乐的魅力。

参考文献

- [1] 孙兆磊. 时代和技法双重限制下的歌颂类管弦乐精品——对吕其明《红旗颂》主题形成过程的剖析 [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17,(02):107-117.
- [2] 冯岳冰. 钢琴作品《红旗颂》的创作及演奏分析 [J]. 黄河之声, 2023,(11):106-109.
- [3] 高倩. 作曲家吕其明热血谱就《红旗颂》[N]. 北京日报, 2021-09-17(019).
- [4] 郑曲曲. 吕其明交响音乐创作的当代文化价值阐释 [J]. 黄河之声, 2023,(12):124-127.
- [5] 蔡蓁如. 吕其明管弦乐作品《红旗颂》和《龙华祭》研究 [D]. 浙江师范大学, 2018.
- [6] 卞婉娟. 交响诗《红旗颂》的音乐分析 [J]. 北方音乐, 2017,37(08):128+130.
- [7] 毛末. 双钢琴作品《红旗颂》曲式分析及演奏分析 [J]. 艺术大观, 2023,(34):33-35.
- [8] 范鹏伟. 中国“红色经典”管弦乐作品的音乐特征与美育路径探究 [J]. 艺术评鉴, 2022,(20):13-16.
- [9] 李查宁, 毕丹. 交响诗《红旗颂》的“中西结合”——对作品主题、配器方式以及体裁和音乐结构的分析 [J]. 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 2018,15(03):77-85.
- [10] 谢美娟. 浅析《红旗颂》[J]. 音乐时空, 2015,(10):78-79.